



北京大学 纪念五四运动 七十周年 论文集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处编

●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大 学 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论文集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处 编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内 容 提 要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北京大学的老中青学者们,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时刻,以“五四”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精神,纷纷撰写论文反思和研究“五四”以来的历史经验,本书选编了有代表性的部分论文。这些文章立于新的历史高度,以宏观的眼光,在世界对话的背景下,进一步探讨了“五四”精神,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價值重估,从“西化”到现代化思潮的演变,东西方文化的争论、交融和传统文化模式的转换,中国文化的根本出路等等重要的热门话题。文章运用了不同的理论和方法,观点纷呈,见解各异,言之成理,富有探索精神和独到见解,是研究和纪念“五四”的新的结晶。

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论文集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处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200千字

1990年3月第一版 1990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册

ISBN 7-301-00978-X/D·094

定价: 4.20元

编者的话

今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在我国正经历着深刻变革的历史新时期,纪念五四运动具有特殊的意义。

北京大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五四运动进行反思,探讨五四精神,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发扬五四光荣传统,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化建设事业,我校文科师生纷纷撰写学术论文,举办科学讨论会。本书选编了较有代表性的部分论文。论文的作者既有年事已高的著名学者,也有崭露头角的青年后学。这些文章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有所不同,因而观点纷呈,见解各异;但又都能言之成理,给人以启迪。真理应该愈辩愈明。把富有探索精神和独到见解的文章汇集成册,或许能较好地体现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精神,也可能是对五四运动的一种较好的纪念。

限于编者水平,书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企望读者不吝赐教。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处

1989年3月

目 录

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	季羨林 (1)
“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	
——纪念“五四”七十周年	王 瑶 (10)
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	严家炎 (31)
反传统与文化心理惰性	孙玉石 (38)
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	
——兼论《学衡》杂志	乐黛云 (56)
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化发展方向的选择	
——兼论什么是五四精神	董学文 (68)
从“西化”到现代化	
——“五四”以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	罗荣渠 (83)
太平洋世纪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	何芳川 (113)
论五四运动与中外文化的交融	王晓秋 (131)
论传统文化	楼宇烈 (145)
“五四”东西文化论争的反思	陈 来 (157)
改革与传统文化模式的转换	张文儒 (175)
简论五四精神	许全兴 (189)
社会潜意识与中国文化心态的现代化	范 文 (198)
论五四精神与祖国统一	萧超然 (207)
李大钊与五四精神	梁 柱 (227)

出路·选择·斗争

——七十年前中国人民选择社会

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江长仁(256)

中国文化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 阎志民 陈生洛(270)

选择性的发展与发展的选择

——关于中国文化传统现代化的思考 萧国亮 马明洁(279)

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

季羨林

最近几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文化热”的高潮。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在接受几十年来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文化建设的任务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我想大家都会同意,人类历史上任何社会,都不能专靠科技来支撑,物质文明必须与精神文明同步建设。我们今天的社会也决不能例外。

在众多的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的论文和专著中,有很多很精彩的具有独创性的意见。我从中学习了不少的非常有用的东西。我在这里不详细去叙述。我只有一个感觉,这就是,讨论中国文化,往往就眼前论眼前,从几千年的历史上进行细致深刻的探讨不够,从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最广阔的宏观探讨更不够。我个人觉得,探讨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只局限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几十年近百年,也不能局限于我们居住于其中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我们必须上下数千年,纵横数万里,目光远大,胸襟开阔,才能更清晰地看到问题的全貌,而不至于陷入井蛙的地步,不能自拔。总之,我们要从历史上和地理上扩大我们的视野,才能探骊得珠。

我们眼前的情况怎样呢?从十九世纪末叶以来,我们就走上了西化的道路。当然,西化的开始还可以更往前追溯,一直追溯到明末清初。但那时规模极小,也没有向西方学习的意识,所以我不采

取那个说法，只说从十九世纪末叶开始。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来看，从全世界文化交流的规律来看，这都是不可避免的。近几百年来，西方文化，也就是资本主义文化，垄断了世界。资本主义统一世界市场的形成，把世界上一切国家都或先或后地吸收过去。这影响表现在各个方面。不但在政治、经济方面到处都打上了西方的印记。在文学方面也形成了“世界文学”，从文学创作的形式上统一了全世界。在科学、技术、哲学、艺术等等方面，莫不皆然。中国从清末叶到现在，中间经历了许多惊涛骇浪，帝国统治、辛亥革命、洪宪窃国、军阀混战、国民党统治、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西化的程度日趋深入。到了今天，我们的衣、食、住、行，从头到脚，从里到外，试问哪一件没有西化？我们中国固有的东西究竟还留下了多少？我看，除了我们的一部分思想感情以外，我们真可以说是“全盘西化”了。

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坏事，我认为，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无论如何，这是一件不可抗御的事。我一不发思古之幽情，二不想效法九斤老太；对中国自然经济的破坏，对中国小手工业生产方式的消失，我并不如丧考妣，惶惶不可终日。我认为，有几千年古老文明的中国，如果还想存在下去，就必须跟上世界潮流，决不能让时代潮流甩在后面。这一点，我想也是绝大多数的中国有识之士所共同承认的。

但是，事情还有它的另外一面，它也带来了不良后果。这最突出地表现在一些人的心理上。在解放前，侨居上海的帝国主义者们在公园里竖上木牌，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许入内”。这是外来的侵略者对于我们民族的污辱。这是容易理解的。但是，解放以后，我们号称已经站起来了；然而崇洋媚外的心理并未消失。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五十年代曾批判过一阵这种思想，好象也并没有收到预

期的效果。到了十年浩劫，以“四人帮”为首的一帮人，批崇洋媚外，调门最高，态度最积极。在国外读过书的知识分子，几乎都被戴上了这顶帽子。然而，实际上真正崇洋媚外的正是“四人帮”自己。现在，“四人帮”垮台已经十多年了，社会上崇洋媚外的风气，有增无减。有时简直令人感到，此风已经病入膏肓。贾桂似的人物到处可见。多么爱国的人士也不能否认这一点。有识之士不禁怒然忧之。这种接近变态的媚外心理，我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凡是外国的东西都好，凡是外国人都值得尊敬，是一种反常的心理状态。中国烹调享誉世界。有一些外国食品本来不怎么样；但是，一旦标明是舶来品，立即声价十倍，某一些人蜂拥而至，争先恐后。连一些外国朋友都大惑不解，只有频频摇头。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来谈中国文化，真正是戛戛乎难矣哉。在严重地甚至病态地贬低自己文化的氛围中，人们有意无意地抬高西方文化，认为自己一无是处，只有外来的和尚才会念经。这样怎么能够客观而公允地评价中国文化呢？我的意思并不是要说，要评价中国文化，必须贬低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确有它的优越之处。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人之所以努力学习西方，是震于西方的船坚炮利。在以后的将近一百年中，我们逐渐发现，西方不仅是船坚炮利，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方面，他们有许多令人惊异的东西。想振兴中华，必须学习西方，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西化是否能够全盘，则是另一个问题，我在这里不去讨论。总之，我们必须向西方学习，今天要学习，明天仍然要学习，这是决不能改变的。如果我们固步自封，回到老祖宗走的道路上去，那将是非常危险的。

但是，我始终认为，评价中国文化，探讨向西方文化学习这样的大问题，正如我在上面已经讲过的那样，必须把眼光放远，必须把全人类的历史发展放在眼中，更必须特别重视人类文化交流的

历史。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公允和客观。我是主张人类文化产生多元论的。人类文化决不是哪一个国家或民族单独创造出来的。法西斯分子有这种论调，他们是别有用心的。从人类几千年的历史来看，民族和国家，不论大小，都或多或少地对人类文化宝库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恐怕是一个历史事实，是无法否认掉的。同样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每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贡献又不完全一样。有的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对周围的民族或国家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积之既久，形成了一个文化圈或文化体系。根据我个人的看法，人类自从有历史以来，总共形成了四个大文化圈：古希腊、罗马一直到近代欧美的文化圈，从古希伯来起一直到伊斯兰国家的闪族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中国文化圈。在这四个文化圈内有一个主导的影响大的文化，同时各个民族或国家又是互相学习的。在各个文化圈之间也是一个互相学习的关系。这种相互学习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文化交流。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文化交流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动了社会前进。

倘若我们从更大的宏观上来探讨，我们就能发现，这四个文化圈又可以分成两大文化体系：第一个文化圈构成了西方大文化体系；第二、三、四个文化圈构成了东方大文化体系。“东方”在这里既是地理概念，又是政治概念，即所谓第三世界。这两大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也是互相学习的。仅就目前来看，统治世界的是西方文化。但是从历史上来看，二者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文化，欧洲史学家早有这个观点，最著名的代表是英国史学家汤因比。他在他的巨著《历史研究》^①里，

① 索麦维尔节录，曹未风等译，上、中、下三册，1986年第5次印刷，上海人民出版社。

从世界历史全局出发,共发现了二十一个或二十三个文化(汤因比称之为社会或者文明):西方社会、东正教社会(又可以分为拜占庭和俄罗斯两个东正教)、伊朗社会、阿拉伯社会、印度社会、远东社会(又可分为中国和朝鲜日本两部分)、古希腊社会、叙利亚社会、古印度社会、古代中国社会、米诺斯社会、印度河流域社会、苏末社会、赫梯社会、巴比伦社会、埃及社会、安第斯社会、墨西哥社会、尤卡坦社会、马雅社会、黄河流域古代中国文明以前的商代社会。^①

汤因比明确反对只有一个社会——西方社会的这一种文明统一的理论。他认为这是“误入歧途”;是一个“错误”。虽然世界各地的经济和政治的面貌都已西化了,其他的社会(文明)大体上仍然维持着本来的面目。文明的河流不止西方这一条。^②

汤因比在本书的许多地方,另外也在他的著作《文明经受着考验》^③中,提出了一个观点:文明的发展有四个步骤: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在《文明经受着考验》中^④,他提到了德国学者斯宾格勒的名著《西方的沉落》,对此书给了很高的评价,也提到了斯宾格勒思想方法的局限性。在《历史研究》的结尾处^⑤,他写道:

当作者进行他的广泛研究时发现他所搜集到的各种文明大多数显然已经是死亡了的时候,他不得不作出这样的推论:死亡确是每个文明所面对着的一种可能性,作者本身所隶属的文明也不例外。

他对每一个文明都不能万岁的看法是再明确不过的了。我在这里附带说一句,汤因比对中国文明寄予最大希望。他说:“世界统

①②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第43页、45—48页。

③ [英]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沈辉等译,1988年第1版,浙江人民出版社。

④ [英]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第10—11页。

⑤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册,第429—430页。

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① 对于他的说法,我不加评论。我在这里举出来,不过是聊备一说而已。

了解了我在上面谈到的这些情况,现在再来看中国文化,我们的眼光就比以前开阔多了。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影响,这是我们的骄傲,也是一个历史事实。汤因比等的看法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但是,到了后来为什么忽然不行了呢?为什么竟会出现崇洋媚外的思想呢?为什么西方某一些人士也瞧不起我们呢?我觉得,在这里,我们自己和西方一些人士,都缺乏历史的眼光。我们自己应该避免两个极端,一不能躺在光荣的历史上,成为今天的阿 Q;二不能只看目前的情况,成为今天的贾桂。西方人士应该力避一个极端,认为中国什么都不行,自己什么都行,自己是天之骄子,从开天辟地以来就是如此,将来也永远如此。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东西双方都要从历史和地理两个方面的宏观上来看待中国文化,决不能囿于成见,鼠目寸光,只见片段,不见全体;只看现在,不看过去,也不看未来。中国文化,在西方人士眼中,并非只有一个看法,只有一种评价。汉唐盛世我不去讲它了,只说十六、七世纪以后的情况,也就能给我们许多启发。这一段时间,在中国是从明末到清初,在欧洲约略相当于所谓“启蒙时期”。在这个期间,中国一方面开始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化也大量西传。关于这个问题,中西双方都有大量的记载,我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一一加以征引。方豪在他的《中西交通

^① 《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1985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第295页。

史》^①中有比较详细而扼要的介绍。我把有关的目次写在下面：

第六章 中国经籍之西传

第一节 明末至清康熙间中国经籍之西译

第二节 清雍正乾隆年间中国经籍之西译

第三节 清圣祖命西教士研究易经之经过

第四节 中国经籍西传对西洋哲学之影响

第五节 中国经籍西传对西洋政治之影响

第七章 中国美术之西传

第一节 欧洲美术之罗柯柯时代

第二节 中国庭园布置术之风行

第三节 中国绘画之西传与流行

第四节 中国用具在欧洲之流行

第五节 华瓷之西洋化及其西传

我觉得，看了这个目次，内容大体上可以了解了。我不再仔细叙述，读者可自行参考。

我现在举一个说明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文化的具体的例子。我想举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歌德，他的一生跨越十八、十九两个世纪，是非常关键的时期。他在1827年1月31日同爱克曼谈话时说道：

（中国传奇）并不象人们所猜想的那样奇怪。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

^① 方豪：《中西交通史》。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7年第6版。参见第5册《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下。

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你经常听到金鱼在池子里跳跃，鸟儿在枝头歌唱不停，白天总是阳光灿烂，夜晚也总是月白风清。月亮是经常谈到的，只是月亮不改变自然风景，它和太阳一样明亮。……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①

这是歌德晚年说的话，他死于1832年。他死后没有过多少年，欧洲对中国的调子就逐渐改变了。据我个人多年的观察与思考，这与发生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有关。在这之前，中国这个天朝大国，虽然已经有点破绽百出，但仍然摆出一副纸老虎的架势，吓唬别人，欺骗自己。鸦片战争一下子把这只纸老虎戳破，真相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西方对中国的政治、经济，进而对中国文化逐渐贬低起来。他们没有历史观点，以为从来就是这个样子，中国从来就没有行过。他们自己的老祖宗所说的一些话和所做的一些事，他们也忘了个一干二净。随着他们科学技术的发展，政治、经济的发展，环顾海内，唯我独尊，气焰万丈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他们敲了一下警钟。他们之中的有识之士开始反思。于是出了象斯宾格勒《西方的沉落》这样发人深思的书。可惜好景不长。到了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法西斯思潮抬头，把西方文化，特别是所谓“北方”文化捧上了天，把其它文化贬得一文

^① 《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112页。

不值。中国人在法西斯分子眼中成了劣等民族，更谈不到什么欣赏中国文化了。不久就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比第一次大战还要残酷，还要野蛮。这又一次给西方敲了警钟。西方有识之士又一次反思，汤因比可以做为代表。预言已久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始终没有爆发。虽然在全球范围内大大小小的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大家总算是能够和平共处了。到了今天，人类共同的公害，比如人口问题、粮食问题、污染问题、土地问题等等，一个个被认识得越来越清楚。两个超级大国似乎也认识到，靠武力征服世界的美梦是不现实的，他们似乎也愿意和平共处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要怎样来认识西方文明，怎样来认识东方文明——中国文明，怎样来认识文化交流，就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了。至于究竟如何，我们将拭目以待！

“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

——纪念“五四”七十周年

王 瑶

(一)

今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五四”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所发生的深刻影响,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从古老的封建旧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转变和发展,早在上世纪中叶即已开始,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上的变革,也经历了器物上的“师夷之长技”,制度上的变法维新,学术思想上的大量翻译欧洲名著等阶段,但直到“五四”时期,才真正进入了深层文化结构的根本改造:即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审美趣味、以至民族性格等的变革与再造。因此就开端的意义说,把五四精神与新文化运动直接联系起来是十分恰当的。新文化运动是在世界形势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民对现代化的历史要求的一种自觉的反应。文学革命如果用一句话来扼要地说明,就是要求用现代人的语言(白话)来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感情(民主、科学);它是与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直接对立的。因此就价值观念说,现代化就是对待文化评估的重要尺度,这是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一种重新评价的态度。鲁迅的《狂人日记》大声疾呼:“从来如此,便对么?”它是一种时代的呼声,因此才发生了那么激动人心的社会影响。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

对此更有明晰的理论表述：“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叫作‘评判的态度’”：“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至今日还是不错吗？”，“对于社会上胡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吗？”胡适由此而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概括：“‘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周作人后来对胡适这一概括给以很高评价，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新文化的精神是什么？据胡适之先生的解说，是评判的态度，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①“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论旗帜，对于一切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判断，包括权威的“圣贤教训”和社会公认的习惯势力，都要提出质疑和批判，当然同时这也就意味着新的价值观念的倡导和确立。它同样也是文学革命的精神。由于过去“文学”一词的涵义极广，几乎包括一切文化典籍，因此对传统文学进行价值重估是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

用甚么价值尺度来进行评判呢？胡适提倡要“重新分别一下好与不好”^②，那标准又是依据甚么呢？应该说，就是“人”的觉醒和解放；这是由现代化要求所产生的必然命题。所以鲁迅说：“最初，文学革命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③。沈雁冰在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上讨论文学问题，首先提出的是“文学和人的关系”^④。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以及当时对国民性和启蒙运动的讨论等，都说明了人

① 周作人：《复古与反动》。

②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

③ 鲁迅：《〈草鞋脚〉小引》。

④ 见《小说月报》12卷1期。